

国学概论

何谓国学

中国学术之分期

先秦诸子之渊源一——古代之宗教哲学

先秦诸子之渊源二——王官之学

先秦诸子之学

秦汉时代学术之新趋势

三 四 四 五 七 八 一二



# 国学概论

## 何谓国学

国学者，吾国已往之一种学问。包含中国学术性质与变迁，而并非为与外国绝对不同之学问也。吾国汉代古谚曰，少所见，多所怪，见橐驼言马肿背。吾国旧时视外人来华者，不知其学。较进，则知可学其一二端。更进，则知其自有其学术，而与吾国为截然不同。然由今之所见，则知中国之与外国，实为大同小异者也。古代各部落，有造舟者，有知制车者，各有所能，各有所不知。今外国自工业革命以来，文明日启，距今亦为时不远。由将来观之，东西两洋之文化，犹古代各部落间文化之关系也。又常有以精神文明、物质文明等以区别东西洋之文化。实亦不然。今世之各社会，皆为文明之社会，其程度相差无几，善亦同善，恶亦同恶，固无何高下也。

## 中国学术之分期

中国学术之源渊

古代之宗教哲学

政治机关经验所得，所谓王官之学

合此两者而生先秦诸子之学，诸家并立

儒家之学独盛

儒家中烦琐之考证，激起空谈原理之反动，偏重《易经》，与道家之学相合，是为魏晋玄学

以上为中国学术自己的发展

至此而佛学输入，为中国所接受。萌芽于汉魏，盛于南北朝，而极于隋唐，其发达之次序，则从小乘至大乘，是为佛学时代，而玄学仍点缀期间。

至唐而反动渐起。至宋而形成理学。理学之性质，可谓摄取佛学之长，而去其不适宜于中国者。

至此中国学术受印度影响之时代，至明亡而衰。

而欧洲学术，适于此时开始输入。近百年来，对中国学术逐渐发生影响。<sup>1</sup>

<sup>1</sup>【前此与欧洲之接触，仅为技术上，而非学术上，故未受若何之影响。】

# 先秦诸子之渊源一——古代之宗教哲学

宗教哲学，今日为对立之物，在宗教起源之时则不然。一种宗教之初兴，必能综合当时人之宇宙及人生观，而为之谋得一合理之解决。此时之宗教，亦即其时最伟大最适宜得哲学。<sup>1</sup>但宗教之为物，不徒重理智，而兼重意志及情感，故易于固执具体得条件，久之，遂变为落伍之物，而哲学乃与之分离。<sup>2</sup>故宗教之与哲学对立，非其本来对立，而由于宗教之陈旧。而论古代之学术，仍必溯源于宗教。

中国之宗教思想，最早盖系『拜物』，《周礼》分祭祀之对象为天神、地祇、人鬼、物魅四类。物魅盖即拜物时代之遗也。此时之思想，太觉幼稚，对于学术思想，无甚影响。

稍进，则为『天象崇拜』，其中又分二期，前期盖在女权昌盛时代，所崇拜之大神，悉视为女性。《礼记·郊特性》曰：『郊之祭也，大报天而主日。』可见古无抽象的整个的天神。后世祭天之郊祭，只是祭日，而《楚辞》《山海经》皆以羲和为女神。整个的地神，古代更其没有，所祭的只是自己所住所种的一块土地，是为社祭。地神的被视为女性，更古今皆然。关于此问题，可参看日本田崎仁义所著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》，王学文译，商务印书馆本。

<sup>1</sup>「凡一种大宗教，必具高深及浅显二方面之理论，以满足于高等与低等之人。」

<sup>2</sup>「宗教与理智方面，仅为其一种手段，使人得理智上之满足，其注重者，乃偏于意志及感情方面，使信之者得感情之安慰，乘坚强之意志以信仰其宗教。夫意志坚强之人，固不免易于固执也，固信教者，常以强烈之感情徘徊，以坚强之意志守旧，以致久而落伍。」

<sup>3</sup>「神之为物，表面视为与人无关的，人外的，实则此种之神，已成为人为的神，具有人之性质。神之组织及一切，皆以人为依据，与人相类。」

女权时代之思想，存留于世者甚少，只有一部《老子》，是表现女性优胜思想的。《礼记·礼运》，孔子曰：『我欲观夏礼，是故之宋，而不足征也。吾得乾坤焉。』说者谓殷《易》先坤。这该是一种女性优胜得遗迹，但殷《易》之内容不传，今所传之《周易》，则完全表现男性优胜之思想矣。<sup>4</sup>

大概中国学术思想，大部分是从周朝流传下来的，殷以前的成分，已经很少了，周朝宗法特别发达，可见其为男权昌盛的社会。而殷朝兄终弟及，是一个母权社会的遗迹。周在西方，殷在东方。后来齐国长女，名为巫儿，为家主祠，不出嫁，而齐太公为出夫。燕人宾客相遇，以妇侍宿，婚嫁之夕，男女无别，反以为荣。楚王妻妹。皆可见风俗与周不同。然此等文化，多已沦亡了。

古代宗教哲学之骨干，为阴阳五行，但二者似非一说。<sup>5</sup>五行之说，见于《书》之《洪范》，后世衍其说最详者，为《白虎通义》之《五行篇》，虽煞费苦心，然究属勉强，予意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乃古代管此工事之五种官。<sup>6</sup>本非哲学上分物质此为五类，后来哲学家就已成事实而强为之说。<sup>7</sup>其说本来不合论理，故虽煞费苦心，终不能自圆其说

<sup>4</sup>「《周易》先乾。」

<sup>5</sup>「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」

<sup>6</sup>「《战国策》」

<sup>7</sup>「亦见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」

<sup>8</sup>「《公羊》恒公二年」

<sup>9</sup>「阴阳最早见于《周易》，然不及五行之说，五行最早见于《洪范》，然不及阴阳之说。且自古至今，从未有合论二者者，后世言阴阳者众，而说五行者寡，则以阴阳能自圆其说，而五行不能也」

<sup>10</sup>「水，通沟渠，建桥梁。火，未知钻木取火，得火不易，设之以保存火种。木，伐木制物。金，冶金之事。土，营建之事。」

<sup>11</sup>「物体之之然，气、液、固体。印度之哲学，言地、水、风、火四大。地，固体；水，液体；风，气体，益之以火。如此分法，尚觉可通。而五行之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，水为液体，木、金、土为固体占其三，无一气体，不必哲学家，亦知为不妥，故决非哲学家分物质为此五类。」

也。<sup>12</sup>

至于阴阳，则因人之认识，必始于两，而现象无论如何错杂，亦总可归纳之而成二组，即谋与非谋，此即正负，正负即阴阳也。故其说处处可通，而古人推论万物，必自小而推诸大，于是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。<sup>13</sup>再进，知万物之原质推一，乃名此原质曰气。假想万物之变化，皆由于气之聚散，而气之所以动荡不已，则由于阴阳二力（阴静阳动）之更迭起伏焉。至此而哲学上之泛神论成立矣。<sup>14</sup>

宗教哲学之进步，既进于泛神论，则事物变动之原因，即在事物之本身。（古代野蛮人不知自然规律，只知人律，其视万物为有知，一切皆神所为。而所谓神，亦有实体，《墨子·天志》《明鬼》之论，所谓天、鬼者，皆有喜怒，欲恶如人，则其证也。遂泛神论既成立，至此自有神而进为无神矣）而别无一物焉，在其外而使之者，此之谓自然。<sup>15</sup>

自然之力，至为伟大，只有随顺利用，而不能抵挡。而自然界之美德，如『不息』『有秩序』『不差忒』等，均为人所宜效法，此之谓『法自然』。<sup>16</sup>自然之规律，道家称之为道。<sup>17</sup>自然现象，永远变动不居，而其变动也，又有一定之规律，是为『变易』，『不易』，加以永不止息，若人之任事，不觉其劳苦然，是为『简易』。所谓『易一名而兼三义』也，不易之现象，是为循环，祸福倚伏之义，由此而生。<sup>18</sup>自然力既伟

<sup>12</sup>五行之变化，有生胜之说，亦作生克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。其中火生土、土生金、金生水、木克土、土克水等，实不甚可通。

<sup>13</sup>此时以阴阳为实质，尚未合哲学之原理。

<sup>14</sup>泛神论者，即谓神即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本身。

<sup>15</sup>自，始也，然，成也。古书自然之『然』字，无作如此之解者。

<sup>16</sup>法家即如是，谓政治上之赏罚，当以自然界之美德为准则也。

<sup>17</sup>《老子》曰：『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』

<sup>18</sup>吾国古代以农为主，注意于不易之现象，故有祸福倚伏等义。盖以为自然界之现象既如是，人事亦当如是也。

大，人根本绝无能为，委心任运之义，由此而生。

自然之力，固无从从时间上指其原理，亦无从从空间上指其根源。然强为之名，固可如此。<sup>19</sup>此种力之原始（系人所强名的），儒家称之为『元』。《易》曰：『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』（《乾卦·彖辞》）《春秋》家谓：『《春秋》以元之气，正天之端。』（《公羊》隐公元年何注）是也。<sup>20</sup>（古人以天为万物之原因，而元为天之原因）在男权优胜时代，最贵此种健行的美德，但女权优胜时代柔能克刚、静以制动等见解，<sup>21</sup>亦仍保有相当的地位。

<sup>19</sup>盖泛神论者，本无因果也，惟无因果之关系，则无可加以思想，故强为之名，而为是说者，亦明知其为强说而已。

<sup>20</sup>其他如《公羊》何注，隐公元年，曰：『天不深正其元，则不能成化。』（《春秋繁露·重政》曰：『元者，万物之本，在乎天地之前。』）

<sup>21</sup>今所存者，以《老子》为代表。

# 先秦诸子之渊源二——王官之学

儒家，出于司徒之官。<sup>1</sup>

道家，出于史官。<sup>2</sup>

墨家，出于清庙之守。<sup>3</sup>

名家，出于礼官。<sup>4</sup>

<sup>1</sup>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『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古司徒之官，助人君，顺阴阳，明教化。游文于六经之中，留义于仁义之际。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。宗师孔子，以重其言，于道最为高。』徒，众也，司徒主教化。《周礼》谓惟战事付司马，狱讼付司寇，此外治民之事，皆司徒掌之也。儒家治民，最重教化，此为其出司徒之官之本色，其欲合西周以前之法，斟酌而损益之。其处己之道，最高者为中庸。待人之道，最高者为絮矩。中庸者，随时随地，审处而求其至当；絮矩者，就所接之人，我所愿于彼者，即彼之所愿于我，而当以是先施之。」

<sup>2</sup>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『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古之史官。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，然后知秉要执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。此为君人南面之术。』其宗旨：一在守柔，一在无为，所称颂者，为黄帝时之说。」

<sup>3</sup>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『墨家者流，盖出于清庙之守。茅屋采椽，是以贵俭。养三老五更，是以兼爱。选士大射，是以尚贤。宗祀严父，是以右鬼。顺四时而行，是以非命。以孝视天下，是以上同。』盖古明堂、清庙、辟雍，皆一物也。蔡邕《明堂月令章句》谓：『明堂者，天子大庙，所以祭祀、饗功、养老、选士，皆在其中。取正室之貌，则曰大庙；取其正室，则曰大室；取其堂，则曰明堂，取其四时之学，则曰大学；取其圆水，则曰辟雍，虽名别实同。』（详见《续汉书·祭祀志注》）阮元《明堂说》谓：『有古之明堂，而有后世之明堂。古者政教朴略，宫室未兴，一切典礼，皆行于天子之居，后乃礼备而地分。礼不忘本，于近郊东南，别建明堂，以存古制。』（见所著《鞏经室集》）盖古之清庙，原极简陋，墨家出于清庙之守，即欲以清庙之旧法，救当时之弊。其根本义曰兼爱，即所谓夏尚忠。其所欲行，盖夏道也。由兼爱故不容剥民自奉，而节用、节葬、非乐之说出。由兼爱故不容夺人所有，而非攻之论出。」

<sup>4</sup>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『名家者流，盖出于古之礼官。古者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。孔子曰：『必也正名乎？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。』礼主差别，差别必

法家，出于理官。<sup>5</sup>

阴阳家，出于羲和之官（古之历法之官）。<sup>6</sup>

纵横家，出于行人之官。<sup>7</sup>

农家，出于农稷之官。<sup>8</sup>

杂家，出于议官。<sup>9</sup>

小说家，出于稗官。<sup>10</sup>

有其由，深求其由，是为名家之学，督责之术，必求名实之相符，故与法家，关系殊密也。」

<sup>5</sup>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『法家者流，盖出于理官。信赏必罚，以辅礼制。』为切于东周时势之学。东周之要务有二：一为富国强兵，一为裁抑贵族。前者为法家言，后者为术家言，说见《韩非子·定法篇》。申不害言术，公孙鞅言法，韩非盖欲兼综二派者。法家宗旨，在「法自然」。故戒释法而任情。不主宽纵，亦不容失之严酷。」

<sup>6</sup>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『阴阳家者流，盖出于古羲和之官。敬顺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。』以邹衍为大师，本所已知，推所未知。其五德终始之说，亦犹儒家之有通三统之论。亦欲合西周之法，斟酌而损益之。」

<sup>7</sup>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『纵横家者流，盖出于古行人之官。当权事制宜，受命不受辞。』又曰：『及邪人为之，则上诈谖而弃其信。』则正指苏、张之流也。」

<sup>8</sup>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『农家者流，盖出于古者农稷之官，播百谷，劝农桑，以足衣食。』《孟子》所载云许行，实为农家巨子，其言有二：一君臣并耕，一则物价但论多少，不论精粗也。盖皇古之俗。农家所愿，即在此神农以前之世也。」

<sup>9</sup>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『杂家者流，出于议官。兼儒、墨，合名、法。知国体之有此，见王治之无不贯。』盖专门之学，往往蔽于其所不知。西汉以前，学多专门，实宜有以祛其弊。故但综合诸家，即可自成一学也。所谓议官，盖即《管子》所谓「喷室」（《管子·桓公问》：『黄帝立明台之议，尧有衢室之问，舜有告善之旌，禹立谏鼓于朝，汤有总街之庭，武王有灵台之复。欲立喷室之议，人有非上之过内焉』），而秦、汉之议郎（秦置，掌议论，汉特征贤良方正之士为之，秩比六百石，统于光禄勋。晋以后废），盖即古议官之制。而齐稷下谈士，四公子之养客，皆为此类。」

<sup>10</sup>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『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议，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。』疑《周官》诵训、训方氏之所采正此类。九流之说，皆出于士大夫，惟此人为人民所造。《汉志》所载，书已尽亡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八百六十六引《风俗通》，谓宋城门失火，汲池中水以沃之，鱼悉露见，但就取之。说出《百家》。犹可略见其面目也，他如塞翁失马、鲁酒薄而邯郸围等，亦或此类。」

以上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诸子十家，其中取小说家，谓之九流，见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注<sup>11</sup>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本于刘向、歆父子《七略》，<sup>12</sup>乃据汉时王室藏书而为之分类，故于学术流别，最为完全。古平民无学术，<sup>13</sup>近人胡适据《淮南要略》作《九流不出王官论》，<sup>14</sup>以驳《汉志》，殊不知《汉志》言其由来，《淮南》言其促进之动机（所谓救时之弊）。<sup>15</sup>二者各不相妨，且互相补足也。<sup>16</sup>

## 先秦诸子之学

讲先秦诸子之学，有应知者数题：

1. 诸子之学重在社会政治方面，不重于哲学科学方面，因诸子本身之发展及其对后来之影响皆如此（此意章炳麟曾言之）。<sup>1</sup>

2. 古有专门<sup>2</sup>而无通学，<sup>3</sup>故诸子之学，就一方面论之则精，合各方面论之则空。其相互攻驳之语，多昧于他人之立场，不合论理，如墨子贵俭，所欲行者乃古凶荒札丧之变礼。而荀子驳以『不足非天下之公患』，<sup>4</sup>殊不知墨子本不谓平世亦当如是也。<sup>5</sup>

3. 先秦诸子之学，非皆个人创造，大抵前有所承，新旧适不适不等，盖其时间有早晚，又地域亦有开通与僻陋之别也。鄙意先秦诸子最要者六家，其新旧之别略如下：

最早者农家，沿袭简陋（时代或地域）之农家社会思想。次之者道家，代表简陋之游牧社会。次之者墨家，其思想与夏代政治颇有渊源。次之者儒家及阴阳家，见多识广，知若干种治法，应更迭使用。最新者

<sup>11</sup> [《刘子·九流篇》同。]

<sup>12</sup> [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『成帝时，诏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，向条其篇目，撮其旨意，录而奏之。会向卒，向子歆总群书，而奏《七略》。故有《辑略》《六艺略》《诸子略》《诗赋略》《兵书略》《术数略》《方技略》。』]

<sup>13</sup> [王官者，大国之机关也。诸子出王官说，虽为汉人推论，然极有理，当时平民，无研究学术者。虽有学术思想，有志研究，亦无所承受，无所商讨，即有所得，亦无人承继之。而古代学术，为贵族所专有，然贵族亦非积有根柢，不能有所成就。王官专理一业，守之以世，岁月既久，经验自宏，其能有所成就，亦固其所。]

<sup>14</sup> [载《新青年》杂志，约当民国四、五、六年时。]

<sup>15</sup> [盖王官之学，固颇有成就，然非遭世变，乡学者不得如此其多，即其所成就，亦不得如此之大也。故《汉志》言因，《淮南》言缘也。]

<sup>16</sup> [若谓出于王官之说非，而惟本《淮南》之说。则试观诸子之内容、文辞，多今古间杂，明非一世之物，惟其源本王官，故能多本往事以立说也。]

<sup>1</sup> [诸子至于哲学方面，颇与古代希腊之哲学相近，其程度亦相仿。盖吾国古代原有此等与宗教混合之哲学思想。诸子即上承此等哲学，而非非加以发展，故诸子之哲学思想，大致相同，不若社会政治之学经发展进步而分歧也。与科学方面，亦有称述，而以见于《墨子》者最多。盖亦旧时之所有，墨子承之也。惟亦不重于此，故其后迄未有何发展。]

<sup>2</sup> [专门者，以如今观之，实即一种学问之派别。]

<sup>3</sup> [通学者，兼取各派，择善而从，至汉方有通学。]

<sup>4</sup> [见《荀子·富国篇》]

<sup>5</sup> [古代治学寡，而因交通不便，得书不易，学术之传播亦难。学者仅能就其近者习之，远者不知或知之不详，且人具成见，学问常以先入为主，故当时人可与一种学问接触，终身不知其他者。此专门之学之所以成也。]



法家，对外主张兼并，对内主张摧毁贵族，总而言之，是打倒封建势力（以开明专制为手段）。

农家之书尽亡，仅存者许行之说，见《孟子·滕文公》上篇。<sup>6</sup>（一）谓贤君当与民『并耕而食，饗飧而治』。此犹乌丸大人，各自畜牧管产，不相徭役（见《后汉书》本传）。<sup>7</sup>（二）主买卖论量不论质，此由交易不重要，物品本少使然，古盖自有此简陋之世，<sup>8</sup>亦或战国尚有此等落伍之地。许行欲率天下而从之，则其事不可行矣。<sup>9</sup>

道家之代表为《老子》，《老子》之旨在无为。为，化也。无化者，无使社会起变化。此犹今人慕效欧、美之文明，社会组织，因之改变。守旧者遂欲闭关绝市耳。当时落后之国，输入先进之国之文明者，盖（一）由其君大夫之好者，（二）由其自谓野蛮而欲驱其民以从当时所谓文明之俗，如商鞅谓秦初父子同室，吾今大筑翼阙，营如鲁、卫是也。<sup>10</sup>《老子》最反对此等，故谓『无为而无不为』，犹言勿以汝之道化民，则民无不化而之善也。此说认社会之恶化，<sup>11</sup>皆由君大夫措施之误。而不知社会因日日在自化，<sup>12</sup>老子特未之见也。

<sup>6</sup>「农家之书，真系讲树艺之木者，为《吕览》之《任地》《辨土》《审时》诸篇。然此非所重。先秦诸子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，非以百亩为己忧者也。《汉书》论农家之学云：『鄙者为之，欲使君臣并耕，悖上下之序。』可见《孟子》所载之许行，实为农家巨子。」  
<sup>7</sup>「且复古必有其方，许行未尝有言（如其有之，则陈相当述之，孟子当驳之，不应徒就宗旨辩难），此则不能不令人疑其徒为高论者也。」  
<sup>8</sup>「无为，犹言无化，古『为』实为同字，观『謁』『訛』为同字之例可知。《论语》：『子曰：张而不弛，文武弗能（耐）也。弛而不张，文武弗为也。』此『为』字即『化』字义，言不能使谷物变化也。」

<sup>9</sup>「古人恒以是为戒，如由余对秦穆公之言是也。」  
<sup>10</sup>「盖当时之效法文明，不过任其迁流所心，非有策划，改变社会之组织，以与之相应也。则物质文明日增，而社会组织随之坏矣。然道家不能改变社会组织，以与新文明相应，而徒欲阻遏文明，则何可得？」

<sup>11</sup>「盖人之趋势，如水就下。慕效文明，其利显而易见，社会组织变坏，其患隐而难知，且亦未必及己，人又孰肯念乱？故社会日日在自化也。」

《庄子》历代著录，皆在道家，《管子》或属道或属法，二家之论，一部分诚与《老子》同。然讲个人在社会重自全之术而归结于委心任运，此《庄子》所有，而《老子》所无。<sup>13</sup>不思彻底改造，而只想因势利导（如不思去民好利之心，而徒欲因其好利而利用之），亦《管子》所有，而《老子》所无，此可见其时代之晚，其社会已不可控制，犹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之异也。

陈旧于农家道家者，为墨家。《淮南要略》云：『墨子学于孔子而不悦，背周道而用夏政。』<sup>14</sup>《吕氏春秋·当染》云：『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，天子使吏角往，惠公止之，其后在鲁，墨子学焉。』<sup>15</sup>「古大庙大学，皆与明堂同物，前已言之。墨子最讲实用，而其书《经上下》《经说上下》《大取》《小取》六篇，讲哲学、伦理，兼及自然科学，极其清深者，古明堂为宗教哲学之所存也。然此非墨子宗旨所在，特师授以书，则从而传之耳。」<sup>16</sup>其宗旨所在，曰兼爱，而行之则以非攻。曰贵俭，而行之则以节用、节葬、非乐。所以动人者，曰天志（其天神为人格神），曰明鬼，而辅之以非命。曰上同，使下之人听于上。

<sup>12</sup>「《列子》说同《庄子》。盖其时代之晚，各个间互相之接触已多，世事变化无方，其祸福殊不可知，故有《齐物论》之说（论同伦，类也）。物论可齐，复何所羨？何所畏避？故主张委心任运。」

<sup>13</sup>「今观《墨子》书，《修深》《亲士》《所染》纯为儒家言。他篇又多引《诗》《书》之文，则《淮南》之说是也。」

<sup>14</sup>「史固辨于明堂行政之典者。故墨子之学，诚为明堂之学也。」

<sup>15</sup>「大学虽东周后尚不能尽废。然未闻有一人合，学成而出仕者。则以所肄者为宗教家言，非实用之事也。大学所教，既为宗教家言，故为涵养德性之地。《礼记》曰：『君子如欲化民成俗，其必由学乎？』又曰：『能为师，然后能长；能为长，然后能为君。师也者，所以学为君也。』又曰：『君子所不臣于其臣者二，当其为尸，则弗臣也，当其为师，则弗臣也。』乞言养老之礼，执酱而馈，执爵而酹（酹，虚口），所以隆重如此者，正以其所诣师者，其初乃教中尊宿耳。又《王制》曰：『出征执有罪，反释奠于学。』凯旋而释奠于学。由此二端，可见古代大学之性质，为宗教哲学之所存也。」

<sup>16</sup>曰上贤，盖前代亲亲，不如周人之甚。参观孙星衍《墨子后叙》，知用夏政之不虚也。

古书多以墨儒并称，亦以儒侠并称，侠者，后世江湖豪杰之流。

盖封建制度之坏，士失所养。<sup>15</sup>而不能为农工商，乃别成为一阶级。性质近乎文者为儒，<sup>12</sup>近乎武者为侠。孔子、墨子，乃就此两社会而感化之，并非两个阶级，为孔、墨所造成也。墨子长于守御（其书末二十篇），盖自侠之团体中来也（《墨子》非攻，故仅取兵法中守之一部分）。

儒为封建制度奔溃时失养之士，性质近乎文的阶级，前已言之（其性质见于《礼记》之《儒行》）。<sup>12</sup>孔子为此阶级中之闻人，惟孔子之道，不终于儒。孔子之学颇博，多知前代之治法。此时前代治法之可考者，有夏、殷、周三代。孔子以为当更迭使用，于是有《春秋》通三统之义（谓封前二代之后以大国，使保存其治法，说见《春秋繁露》）。孔子又观治化升降，以为最古之时最美，谓大同，时代渐降则渐劣，谓小康，说见《礼记·礼运篇》。然则更劣于小康，必为乱世矣。《春秋》张三世之以，以二百四十年，分为三世，据乱而作，（表示治乱世之法。）进于升平，（小康）更进于太平，（大同）（见于《公羊》何《注》）盖欲逆挽世运，复于郅治也。

孔子之道，具于六经，而六经之中，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为尤要。《易》言原理，《春秋》据此原理而施诸人事。故曰：『《易》本隐以至显，《春秋》推见至隐。』（《史记》）其根据原理施诸人事，则恃君长为之。故《易》曰：『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』（《乾

<sup>16</sup>盖本夏道，而夏时较古，人之思虑较少，人与人对立程度浅，乐尽力以服从于其上。』

<sup>17</sup>封建制度之诸侯、大夫，多喜养士，及其国灭家亡，或习奢侈而暇养士，而士失所养。』

<sup>18</sup>游说之士，大抵从儒中出。』

<sup>19</sup>儒之义为柔，若曾子之竟竟自守，言必信，行必果者，盖其本来面目。』

卦·系辞》）而『《春秋》以元之气，正天之端，以天之端，正王之政，以王之政，正诸侯之即位，以诸侯之即位，正四竟之治。』（《公羊》隐公元年《注》）此略近希腊柏拉图推最高之哲人为君之义。惟希腊人无统一思想，故只计及一国之君。孔子则不然，故又计及诸侯之上，当有一王耳。

孔子所谓大同，盖农业共产小社会。所谓小康，则封建之初期，阶级虽已成立，旧时共产社会之规模，尚未甚坏者也。自此以后，资本势力又继封建势力而起，治化只有日趋于劣。不知铲除阶级而欲借政治之力，以谋革命之彻底完成，可谓南辕北辙。然自近代以前，学者之见解，固皆如此（革命常为政治的），不足为怪。

《易》之大义，为『变易』『不易』『简易』三者。『变易』谓宇宙间一切现象，无一息而不变；『不易』谓万变之现象，仍有其不易之则。（如气候时时在变，四季亘古如斯。古人只有循环之思想，无进化之思想。辩证法之变动，非其所知）『简易』，则言自然力出于自然，非如人之作事，倦而必须休息，故能永不间断差忒，犹佛家之贵无为而为贱有为也。此意义亦甚周匝（《易》一名而含之义，见易纬《乾凿度》，《周易义疏·八论》之一引）。

儒家出于司徒之官，故重教化。而其教化也，必先之以养。孔子言先富后教（《论语·子路·子适卫章》），孟子言有恒产然后有恒心，首欲浚井田制度，继之以庠序之教（《梁惠王》上、《滕文公》上），此皆思想也。此为历代儒家之传统思想，将来当再言之。惟儒家在政治上之抱负，因社会组织已变，无由实施。其有于中国者，乃在社会方面：（1）重人与人相和亲，而不重政治力量之控制。（2）儒家最重中庸，故凡事不趋极端，制度风俗，皆不止积重难返，而中国人无顽固之病。（3）儒家重恕，『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』。<sup>20</sup>其标准极简单明了，而含义又极高深，所谓愚夫愚妇，与知与能，而圣人有所不能尽。恕成为

<sup>20</sup>谓『矩』。』

普遍的人生哲学，无意间为社会保持公道，此儒家之大有造于中国社会者。

阴阳家之书尽亡，惟邹衍之说，略见《史记·孟荀列传》。其说看似荒诞，实则不过就空间（彼所谓中国）、时间（所谓黄帝以来）两方面，据所知者，求得其公例，而推诸未知者耳。其研究结果，盖以治国当有五种办法。更迭使用，是为五德终始，<sup>21</sup>（衍之五德终始，始从所不胜，即水、土、木、金、火；汉末乃改从相生之次，为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）此正犹儒家之通三统，彼所谓一德，当有其一套治法，非如后世阴阳家专讲改正朔、易服色等空文也。（《汉书》有《邹奭子》十二篇，则已拟有实行之法，果难施与否，今不可知，要非如汉人之言五德者，徒以改正朔、易服色为尽其能事也）故与儒家可列为一阶段。<sup>22</sup>

以上诸家知识，均得诸历史上，均欲效法前代，惟其所欲法者，新旧不同耳。惟法家则注重眼前的事实，<sup>23</sup>故其立说最新。法家之「法」字，又有广狭二义，广义包法、术二者言之，狭义则与术相对，<sup>24</sup>法所以治民，术所以治治民之人也，见《韩子·定法篇》。法家之书，存者有三：（1）《管子》、<sup>25</sup>（2）《韩非子》、<sup>26</sup>（3）《商君书》<sup>27</sup>也。法术之论（治民及驭臣下之术）三书多同。惟《管子》多官营大事业，干涉借贷，操纵商业之论（大体见《轻重》诸篇）。《商君书》则偏重一民于农战，（意欲遏抑商业）盖齐、秦经济发达程度不同，故其说如此。

<sup>21</sup>《汉书·严安传》载安上书引邹子之言：「政教文质者，所以云救也。当时则用，过则舍之，有易则易之。」即五德终始之说也。

<sup>22</sup>《太史公自序》述其父谈之论，谓阴阳家言，「大祥而众忌讳，使人拘而多所畏」，此乃阴阳家之流失，而非其道遂尽于是也。

<sup>23</sup>切合于东周时势。

<sup>24</sup>申不害言术，公孙鞅为法，韩非盖欲兼综二派者。

<sup>25</sup>《二十四卷》，原本八十六篇，今佚十篇。

<sup>26</sup>《十卷》，五十五篇。

<sup>27</sup>《五卷》，原本二十九篇，今佚三篇幅。

<sup>28,29</sup>法家之论，能训练其民而用之，术家则能摧抑贵族，故用法家者多致富强，<sup>30</sup>秦且以之并天下也。<sup>31</sup>盖惟用法家，乃能一民于农战，其兵强而且多（见《荀子·议兵》），亦惟用法家，故能进法术之士，而汰淫靡骄悍之贵族（列国皆贵族政治，独秦行官僚政治），政事乃克修举也。

<sup>28</sup>《齐工商之业特盛，殷富殆冠海内》，秦地广而腴，且有山林之利，开辟较晚，侈靡之风未甚。

<sup>29</sup>《韩非子》多言原理，兼及具体之条件。

<sup>30</sup>如韩申不害相韩昭侯十五年，内修政教，外应诸侯，终其身，无侵韩者。卫吴起为魏文侯将，拔秦五城，守西河以拒秦，韩、文侯卒，事其子武侯，遭谮奔楚，相楚悼王，南平百越，北并陈、蔡，却三晋，西伐秦，诸侯皆患楚之强。

<sup>31</sup>卫鞅（商鞅）入秦，说孝公变法修刑，内务耕稼，外劝战死之赏罚。孝公任之，遂大强。故秦并天下，原因虽有数端，以人事论，则能用法家之说，实为其一大端。

## 秦汉时代学术之新趋势

「交通便利，各种学术，渐相接触，启通学之机。」<sup>1</sup>利用学术者，将抉择或折衷于诸学之间，而求其至当。故其结果，为不适宜于时代之学术，渐见衰息（如墨家、农家）。其适宜者亦渐与他学相混焉。<sup>2</sup>

秦有天下，仍守法家之学不变，然此时法家用整齐严酷之法，以训练其民之办法，实已用不着。<sup>3</sup>秦亡之后，众皆以其刻薄寡恩，归咎于法家之学，一时遂为众所忌讳。是时急于休养生息，故道家之说颇行。<sup>4</sup>然道家主无为，为正常之社会言之则可；社会已不正常，而犹言无为，是有病而不治也。故其说亦不能大盛。

<sup>1</sup>「前此列国互相猜忌，往来之间，非有节符不能通，而关之稽查尤严，其极，遂至借以为暴。汉有天下，此弊尽去，有『通关梁，一符传』之美谈，而交通便利矣。」

<sup>2</sup>「至此自先秦之新发明的时代，变为两汉之整理的时代。犹西洋史上之希腊——发明——与罗马——整理——之关系也。」

<sup>3</sup>「法家宗旨，在『法自然』，故戒释法而任情。揆其意，固不主于宽纵，亦不容失之严酷。然专欲富国强兵，终不免以人为殉。《韩非子·备内篇》云：『王良爱马，为其可以驰驱；勾践爱人，乃欲用以战斗。』情见乎辞矣。在列国相争，争求统一之时，可以暂用，治平一统之时而犹用之，则恋蓬庐而不舍矣。秦之速亡，亦不得谓非过用法家言之咎。」

<sup>4</sup>「如孝惠元年，曹参相齐，尊治黄、老言者盖公，为言『道贵清静，而民自定』，参用之，相齐九年，齐国安集。及继萧何为相，举事无所变更，择谨厚长者为郡国吏，掩人细过，不事事，百姓歌之，有『载其清靖，民以定壹』之辞。孝景时，窦太后好黄、老术，皆其著者。」